

# 太湖环境对江南文学家族演变及其创作的影响

罗时进

**摘要:**江南地区自中古以来就渐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渊藪,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辉煌源地。对于这一突出的文化和文学现象形成的原因,可以从多方面做出阐释。而要理解这一地区在中国文化和文学上何以形成巨大的创造力,是不能忽视江南的文化地理环境这一重要因素的。

**关键词:**江南;太湖流域,文学家族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11)05-0176-07

**作者简介:**罗时进,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江苏 苏州 215123)

## 一、湖泊的文化地理意义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理解为历史的产物,其特性决定于各民族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sup>①</sup>也就是说,要理解江南在中国文化和文学上何以形成巨大的创造力,是不能忽视江南的文化地理环境的<sup>②</sup>。对于江南,我们具体定位于环太湖地区<sup>③</sup>,而湖泊作为一种文化地理很早就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葛绥成先生编译的《世界文化地理》中即有关于“湖水和文化地理的研究”,其中指出:“湖水为内陆的水路,亦属重要。湖水小的,可以用为养鱼,可以调节其附近的气温;位于盆地的,成为一政治区域的中心;位于高原的,可为主要的境界,可以涵养水源而成为大河的水源;或则沿岸有瀑布,用为水力发电的原动力,其于人类文化的发达,实与以莫大的贡献。言其成功的原因,种类不一,于文化的研究上,大有兴味”<sup>④</sup>。

在人类发展史上,多有大海、长河孕育文明的例子,如爱琴海文化、地中海文化以及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形成的“两河文明”、由黄河形成的黄河文明等,而鲜见湖泊成为文化发源地之例。这主要是因为地理形貌的静态化和区域范围的局部化使湖泊缺少海洋和河流的流动性,也就缺少了人文信息的交汇和传播,源起意义的文明不易生成和发展。但也正由于湖泊地理形貌的静态化,使湖泊的自然生态往往得到较好的保护,湖泊周围地带成为风调雨顺的经济沃野和风景清嘉之地;而区域范围的局部化,又使环湖地区成为相对较易征服和管理的小自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样的环湖地区往往能够在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上显示出一定的优势,当这种优势逐渐累积出相当程度的人文含量后,就能够呈现政治和文化的后发现象,产生“环湖政治区域”

收稿日期:2011-01-12

① [美]博阿斯:《原始艺术》,金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② 文化地理环境,实际上不仅涵盖自然地理的因素,也涵盖了某些社会环境的因素。

③ 冯贤亮在《学术月刊》2008年第1期发表《史料与史学:明清江南研究的几个面向》认为,明清时代人们心目中的江南,“应当是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平原地区”,这一看法可以赞同。

④ [日]西田卯八等:《世界文化地理》,葛绥成编译,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189页。

与“环湖文化”。

关于“环湖政治区域”,葛绥成先生编译的《世界文化地理》中曾有所说明:

以湖水为中心,作成政治的结合者,世界多有之。盆地中的湖水,即以其周围的地方为政治上的区域,像我国的湖南省,以洞庭湖为中心而成立,江西省,以鄱阳湖为中心而成立,都是著例。加拿大以温尼伯及温尼贝戈西斯两湖为中心成立马尼多巴州,亦为一例。此外又有以湖水为中心而集合数国数州者。瑞士开国时代,以卢塞纳为中心,联合乌里、休华支、温德尔华尔三州(今日合卢塞纳州而为四州),于1921年开国。此外,在同国内,以苏黎支湖(Zurich)瓦林湖为中心,有苏黎支、休华支、格拉尔斯、圣加连的四州;及以纽巧得尔湖为中心,有波达、纽巧得尔、伯尔尼三州。北美加拿大的安大略州及美国的密执安、俄亥俄、威斯康星、明尼苏达三州,围绕于苏必略湖的周围;密执安、威斯康星、伊利诺斯、印地安那四州,围绕于密执安湖,加拿大的安大略州与美国的密执安、俄亥俄、宾夕尔瓦尼亚、纽约四州之间,有伊利湖。<sup>①</sup>

在“环湖文化”中,洞庭湖文化、鄱阳湖文化和美国密执安湖文化、日本琵琶湖文化都各具特色,而环太湖文化无疑是一个典型。所谓环太湖文化是太湖地区一切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总称。在这两者中,物质文化面对经验世界的现实,而非物质文化则面对价值。物质文化的动力是基本生存和发展,而非物质文化的动力是以适意生存和美感为境界的文明创造,文学、艺术、人文社会学术和园林等环境景观是其主要的精神产品。这些精神产品最终形成了著名的“文献之邦”,并产生出一批文化艺术和传统文化研究的巨擘人物,催生出一个具有充分人文气息的文化型社会<sup>②</sup>。

我们在研究环太湖文化时,比较侧重于非物质文化部分,虽然它与物质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物质文化的发展是非物质文化的支撑,是非物质文化得以滋长、繁荣土壤和温床。在清代江南,物质文化对非物质文化的支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没有前者,后者肯定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那个面貌;但是正如地域生态环境可以影响地域人文形态,人文形态是人的创造,因此这种形态必然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同样可以反作用于环境,以特殊的模塑力改变生态。环太湖文化和环太湖生态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种良性的隐性互动中。

## 二、太湖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关系

我国从上古到西晋末,北方不仅是政治中心,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都处于领先地位。就文明程度来说,当时江南之于北方似乎还是一片化外之地。但是,政治中心往往与对自然和人类最具毁灭性的战争相联系,而相对来说,江南远离政治中心,也就较少受到战争的破坏。当兵燹使黄河流域的经济命脉不断受到巨大打击时,东晋以后江南的经济一直在发展、在增殖,并且具有了接济北方的能力,到晚唐时已到了“天下以江淮为国命”的程度<sup>③</sup>,其后“苏、常、湖、秀,膏腴千里”,一直是“国之仓庾也”<sup>④</sup>。

江南的经济发展一方面与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与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有关。关于江南的自然环境,经济史研究者这样分析和评价:

江南地区自然环境优越,地势平坦,平原辽阔,江海怀抱,湖泊河港纵横,水资源丰富。亚热带气候温和湿润,日照充足,无霜期长,雨量充沛,土壤肥沃,非常适合农作物的生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江南地区沿江沿海的高田地帶,地势高仰,多沙质土壤,具微碱性,适合种植耐旱并有抗碱能力的棉花。太湖周围的低田地帶多水,其保肥

① [日]西母卯八等:《世界文化地理》,葛绥成编译,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95页。

② 参见《世界文化地理》上编《清代江南文化型社会的形成》。

③ 杜牧:《上宰相求杭州启》,载《樊川文集》第16卷。

④ 范仲淹:《范文正集》卷9《上吕相公并呈中丞咨目》,四库全书本。

能力强的壤质粘土,适合种植桑树,其中性壤土适合种植喜湿的水稻。<sup>①</sup>

在农业社会,这样的自然条件既保证了主要农产品(稻)的生产,又惠及于农副产品(棉、桑)的生产和加工,只要善于开发和利用,经济的繁荣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以上所论及的自然环境中,“水”具有核心的地位。对于水的历史文化意义,俄国著名生物学家梅契尼柯夫在《文化与伟大的历史河流》一书中认为:“水不仅仅是自然界中活动的因素,而且是历史的真正动力。……不仅仅在地质学界和植物学界的领域中,而且在动物和人类的历史上,水都是刺激文化发展,刺激文化从河流系统地区乡内海沿岸,并从内海向大海过渡的力量”<sup>②</sup>。把水视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深刻的洞见。中唐时期李肇撰写《国史补》在论及江南的区域优势时,就着重强调“凡东南邑郡,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sup>③</sup>。《宋史·食货志》也强调“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sup>④</sup>。清人陶澍《太湖厅浚雕鹗诸河碑记》更清楚地指出太湖水利与“衣食”、“财赋”之关系:“天下之水利,莫大于江南,太湖又江南水利之大者也。……旱潦于是乎备,衣食于是乎生,财赋于是乎出。”<sup>⑤</sup>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水”乃自然生态之始基,生命万物之命脉。水环境对文明的形成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在漫长的农业社会,农业文明对水源有绝对的依赖。充足的水源能够保证灌溉之需和生活之便,而河流周围通常形成茂密的植被,湿润的气候宜于动植物生长。水域延展的平原腹地往往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为人口繁殖和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可以说,水之利,即人之利;水之生态,即人之环境;从深远的意义上说,亦人文化成之必要条件。

江南地区人文环境对自然环境即显示出明显的依存性。所谓人文环境,是一种与历史传统、自然环境、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密切相关的,在社会本体中包含了群体态度、价值观念、信仰系统的无形环境,在本质上属于社会性环境。在其相关因素中,历史传统和自然环境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发挥作用,产生集体无意识的影响;而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是以主观能动的运作,创造所需要的社会因素和具有价值意义的精神氛围。

在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两者之间,前者对后者具有支撑作用,而经济活动显然又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优越的自然环境,造成经济发达;经济发达惠及文人士林,有利于开展文化活动,从而推动文化发展。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优越的自然环境是造就文化环境的温床,文化环境受到自然环境的作用,甚至为自然环境所派生。这正是我们论及江南的人文环境时,总不能不将其与优越的自然环境相联系的原因所在。实际上,当人们对“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sup>⑥</sup>这一著名评说深表赞同时,已经包含了对“东南”、“江浙”自然环境的莫大肯定与敬意,因为财赋丰盛、人文昌隆的源泉,正在于良好的自然生态。

当然,江南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关系,既表现为自然环境对文化环境的作用,同时也表现为文化环境对自然环境的反作用。江南地区人文蔚起,形成了优越的人文生态。这种人文生态中最精华的部分——人文智慧——对经济发展必然起到促进作用,而经济的发展可以为环境建设提供丰富的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里人文智慧还具有超越经济层面而发挥作用的可能。它往往能够表现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态度和策略,直接运用于对自然的适度利用和对生态的积极保护,或当自然生态受到不可抗力的影响而受到破坏时,做富于智慧和远见的恢复。事实上,良好的人文生态中有一种对社会控制的软力量存在,这种力量在江南地域空间的调控作用相当明显。这也正是中古以来江南自然生态与经济、文化能够长期良性互动,保持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① 方行:《清代江南经济:自然环境作用的一个典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② 转引自[德]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四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37页。

③ 李肇:《国史补》卷下。

④ 《宋史》卷173《食货志》

⑤ 陶澍:《陶澍集》下册《太湖厅浚雕鹗诸河碑记》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6页。

⑥ 参见冯桂芬纂《同治苏州府志》卷首,清光绪八年江苏书院刊本。

### 三、文化家族向太湖地区聚集与演化

太湖塑造了江南的自然生态,支配了江南的民生经济,也影响了江南历史的创造。早在清代初年,太湖的面积大约已有3.6万顷,东西广200余里,南北袤120里。从总体上看,太湖水主要源自西南部,由东北岸泻出,其间水网纵横,水系发达,而水网系统覆盖地区就形成了太湖湖区,包括湖面和沿湖低山丘陵的面积总计约3426平方公里,环太湖全流域面积约有3.6571万平方公里。湖区年均温度为15.5至16.5℃,7月平均气温约28.5℃,1月均温约3℃<sup>①</sup>。整个环太湖地区皆有水路航道相通,这种水路航道正成为江南城镇崛起之处,而在环太湖栉比鳞次的城镇基础上,苏州这一大都会形成了。这是太湖地区政治、经济的中心,也是文化的中心。

与国内其它主要的文化板块如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关东文化、荆楚文化、三晋文化、陕秦文化相比,环太湖文化(吴文化)是唯一的内陆湖水文化,这种文化环境为土族阶层的发展提供了绝佳的空间。这里中古时代就形成了一个土族阶层,《文选》卷二八陆机《吴趋行》中有“八族”、“四姓”之说:“邦彦应运兴,粲若春林葩。属城咸有土,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德侔山河。礼让何济济,流化自滂沱。”李善注引张勃《吴录》曰:“八族:陈、桓、吕、襄、公孙、司马、徐、傅也;四姓:朱、张、顾、陆也。”永嘉以后,随着中原地区政治动荡,战争频仍,北方土族不断南下,自然生态良好,政治相对安定,农渔经济富庶的环太湖一带逐渐成为全国的人才聚集之地。南宋以后衣冠人物,萃于东南,诚如章学诚指出:“江浙钜族,多因宋室南迁,即已聚族,至今五六百年,祠墓具存,传世多者,至三二十世,少者亦十有余世,非若欧、苏之不出五六辈也”<sup>②</sup>。而江浙一片中,环太湖地区,尤其是京口到松江一线聚族更密。钱谦益给常熟王氏撰谱时云:“……高皇帝渡江而后,历年三百,传世十三。”<sup>③</sup>像这样的北宋靖康之变南渡的家族在江南其数相当可观,吴仁安在《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中云:“宋元时期入迁江东的著姓望族,有武进管氏、毗陵吴氏、无锡秦氏、丹徒陈氏、常州周氏、无锡过氏、常州徐氏、无锡丁氏、无锡三沙王氏、宜兴任氏、吴县管氏、常熟屈氏、苏州尤氏、江阴章氏,武进赵氏、阳湖周氏、武进袁氏、京江戴氏等等。这些著姓望族,大都是由中原等地渡江入迁江东之地的”<sup>④</sup>,至清初时居于江南已有三百年左右。

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迁移是一个“使固定成为可能的神话”,“就像文化植根于时间和空间当中一样,社会及其成员也植根于文化当中:这些有机体都要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发展、生存和死亡。在环境中找到一个静止的点,并具体设计自己的迁移、感知、秩序和建构,这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的需求”<sup>⑤</sup>。由迁移而造成的“使固定成为可能的神话”,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地理空间的转换增加了新的文化质素,或产生了新的文化联结,导致新的文化特性和新的文化标准的形成。据此来看那些从北方中原地区汇聚于江南的渡江冠冕,他们大都本“断断有洙泗之风”<sup>⑥</sup>,在经历了长期“江东化”的过程后,许多家族与江南原住世族一起在江南文化环境中逐渐演化,成长为江南文化家族。这种演化是一种文化的发展变化,“是习得的,而不是经由生物遗传而来的”<sup>⑦</sup>,是家族性的传递放大,而不是个人的孤立的变化。所谓家族性的传递放大,其主要内容首先是祖宗认同的家族意识,表现为对家族之根的追寻,对亲属关系在社会关系处理中优先权的确认;其次是对祖德、祖训的弘扬,对家族精神的理解、接受、继承,在不断感知的行为环境中

① 参见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7页。

② 《文史通义新编·家谱杂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③ 《牧斋有学集》卷15《王氏族谱序》四部丛刊本。

④ 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⑤ [英]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鲍文妍、张亚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页。

⑥ 宋徵舆:《江南风俗志》

⑦ [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瞿铁鹏、张钰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页。

形成主体精神定向;再次是对家族文化传统的认知,习得并加以传承,使家族典籍更为丰富,文学、艺术、学术之声名更为彰显。苏州文征明有所谓“诗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之说<sup>①</sup>,事实上,演化的过程就是“积”的过程,它标志着文化家族的崛起,当这种“积”的成果在社会文化指标体系(诸如科举、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等)中达到突出的数量和质量后,“诗书之泽,衣冠之望”就显示出相当的文化藏育,表现出相当突出的文化强度<sup>②</sup>,而这些江南文化家族所在的地域与其它地域相比,自然就显示出比较优势而成为我们所说的“文化渊藪”和“文学源地”。

#### 四、太湖环境与江南文化家族特质

我们在注意太湖地域自然环境对文化家族的吸引,以及江南文化家族演化过程对文化高原崛起的意义的时候,自然可以注意到太湖环境对江南文化家族特质形成的影响。人们“对于世界的解释实际上从来不是完全客观的,而是由文化构建的”<sup>③</sup>,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丹纳将具有自然属性的地理与具有精神属性的风俗看作形成人类文明的要素。他说:“每个地域有它特殊的作物和草木,两者跟着地域一同开始,一同告终。……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他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我们研究自然界的气候,以便了解某种植物的出现,理解玉蜀黍或燕麦,芦荟或松树;同样我们应当研究精神上的气候,以便了解某种艺术的出现,理解异教的雕塑或写实派的绘画,充满神秘气息的建筑或古典派的文学,柔美的音乐或理想派的诗歌。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sup>④</sup>

从这个意义来说,“江南文化家族”既是“物质文明”的产物,也是“精神文明的产物”。江南文化家族文治的色彩,离立的姿态,市隐的情结都受到这种物质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影响。

先说文治色彩。历次移民潮促成了南迁北方士族与江南原住士族的汇聚,形成了新的士族阶层,而经过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竞争、淘汰,一批真正能够诗礼传家且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世家大族成为新时代的文化家族。随着江南崇文右学的文化型社会的形成,他们代代坚持以学为先,以儒为业,以文治家,而随着在明清时代新的科举制度中所得“红利”增多,以文兴家耀族取得成功,他们在社会上自然占有了重要地位,成为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甚至成为文化代言人。无论与以往历代文化家族相比,或者与其他区域相比,尤以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文治色彩更强,同时也拥有了更多的文化表达力和代言权。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大量的文学创作,正是这种文化表达力的显示,也具有某种社会文化代言的属性。

次说离立姿态。在政治中心再度向北方转移以致到北方异族成为统治阶级的强大力量时,江南文化家族作为汉族传统文化最坚实的社会基础而受到严厉、残酷的打击,这时江南文化家族共同体以社会关系和亲情关系的完美结合,利益属性和血缘属性的切合无间,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的相辅相成,成为应对统治威权的精神同盟和堡垒。社会历史变动而形成的政治生态环境,使江南文化家族也形成了自己的家族政治文化。这是以家族为本位,以家族共同体的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国同构为认知取向,以道义担当为使命的家族政治观念体系。在这种家族政治文化的作

① 《文徵明集》卷18《相城沈氏保堂记》

② 我认为文化的发展程度是可以比较和测度的,而比较和测度的根据就是“文化强度”。所谓文化强度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体系中主要文化要素所表现出来的量。它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科举。在明清两代,科举成就是对人文风习、教育水平、学术训练、知识积累的较为全面的检验,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和影响力,无疑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最重要文化元素之一。正因为如此,对科举竞争的考察可以成为我们对地域文化进行强度分析、比较的根据。二是文献。文献是文化人才以及这些人才创造能力的集中体现,文献的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某个地域文化创造的能力,故“文献之邦”往往可以成为文明的标识,也是不同地域间进行文化强度比较的可靠根据。

③ [美]威廉·A·哈维尔:《文化人类学》,瞿铁鹏、张钰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页。

④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8—9页。

用下,清代江南文化家族与历代文化家族同样,是民族国家凝聚力的基础,但有所区别的是,清代江南文化家族既保持对国家的向心力,同时又显示出相当的离立姿态,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这种家族政治文化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清代江南文化家族士人行为和文学创作的种种复杂性,正是缘于其家族政治文化的作用。

再说市隐情结。南宋以后,江南城市化进程加快。文化家族是江南城市文化的引领者,是城市奢华消费生活的热衷者。但这种完全不依赖土地的生产方式和与自然较为隔离的生活状态,在为文化家族展开新的生活图景的时候,也激发出市隐的情趣和理想,产生特具江南特点的隐逸心态。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建构贴近自然,能够“亲土”的“耕读”生活,或将自然山水最大限度地复制到家族活动空间,恢复对真山真水的记忆,成为文化家族的追求。这种市隐向往的实现,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拥有一种新的物质生活方式,还在于拥有一个精神生活的空间,一个避世的寄托。这种文化情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江南文化家族士人出仕与回归的行为轨迹。与其他区域文化家族相比,江南文化家族具有更深刻的回归心理,而至清代,江南市隐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更为优裕,文化家族文学创作中这种回归主题也更为突出。

## 五、太湖环境与江南家族文学风格

无锡华琪芳《锡山浦氏宗谱序》云:“尝历览锡中胜概,见夫东连渤海,北控长江,南引金阊,西回震泽,九龙络绎乎其左,五湖萦绕乎其右,固三吴一大都会也。地灵所聚,蔚为人文。于是科名勋业之华,德行文章之美,诗礼簪缨之族,冠裳闾閻之门,往往独盛于吾锡。”

江南文化家族的文学创作与太湖水环境为主要特征的“地灵所聚”也是密切相关的。在这里我们不妨把“地灵所聚”看作“江山之助”。这种“江山之助”从总体上说,是形成与北方文化区域完全不同的南方特色,梁启超云:“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sup>①</sup>。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中也有近似的表达:“天地之气,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蕴藉而萦纤,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温润和雅,其偏者则轻佻浮薄;北方山水奇杰而雄厚,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刚健爽直,其偏者则粗犷强横。此自然之理也。于是率其性而发为笔墨,遂亦有南北之殊也。”<sup>②</sup>

但是这里的“南北之殊”还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尚不能具体体现江南文化家族文学创作突出的“灵”和“清”的特征。所谓“灵”,即诗文中灵活进退的人生态度,钟灵毓秀的风物气象,灵光独照表达视角,灵性活泼的运思结撰,灵犀特具的文心意蕴,灵润秀逸风格气局。至于其作品语言的吐属清华,辞章的文采清蔚,意度的闲雅清疏,风调的古朴清深,意境的秀朗清疏,显然又无不根于一个“清”字。“灵”和“清”是广义“南方”中的“江南”文学的独特所在,也是江南家族文学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之产生,穆彰阿为吴县潘世恩《潘氏科名草》所作《序言》中有所分析:“盖闻文章之事关乎其人之学之养,而其所由极盛而不已者,则非尽其人之学之养为之,而山川风气为之也。江南乃古名胜之区,其分野则上映乎斗牛,其疆域则旁接乎闽越,而又襟长江而带大河,挺奇峰而出秀巘,故其灵异之气往往钟于人而发于文章”<sup>③</sup>。显然正是江南的生态环境,以强大的自然山水的“灵异”力量,给予吴地土族以精神陶冶和美感启迪,使其具有了丰富的创作源泉,激发出不尽的创作灵感,结出了丰硕的创作成果。由此江南文化家族也有了更为充分的要素资源,具有了更坚实的自立基础和传承力量。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卷2《中国地理大势论》。

② 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卷1 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版。

③ 潘世恩:《潘氏科名草》光绪三年吴县潘氏燕翼堂刻本。

这里需将尤侗《百城烟水序》中“夫人情莫不好山水,而山水亦自爱文章。文章藉山水而发,山水得文章而传,交相须也”<sup>①</sup>,这一观点提出来做一些讨论。尤氏乃江南文化世家出生,对吴中山水与文学的关系有深刻的感悟。此处尤氏提出“交相须”一说,认为山水环境与文学创作互相作用,为相当真切之论。这是对董其昌“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诗为境”<sup>②</sup>说的发展,比单向理解“江山”对文学“之助”,一味强调自然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要全面一些。江南山水,甚至包括再造山水的园林,之所以成为名胜,与其中的人物活动有绝大关系。而人物活动于山水之中,以我观物,形诸文字,使江南山水的美感得到再现,价值得到提升,增加了它的传播动力,扩大了它的影响。一地之山水,则成海内之景观;一时之景观,则成永恒之名胜。

当然,仅仅从“山水得文章而传”的层次上理解“山水亦自爱文章”还不够,“山水亦自爱文章”的深层意义在于揭示出了“山水”对“文章”的内在需要。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文化对地理空间的特殊意义。我们知道文化不仅分布于一定的地理空间,同时也会以自身特有的活力作用于地理空间,并赋予地理空间一定的意义。就环太湖地区而言,大量的文化家族代表人的聚集为太湖文化树立了一个个标志,他们的文学艺术和学术文化的实践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太湖文化的内涵,成为江南文化母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注意,这种江南文化母语具有强大的孳生力量,它能够通过人的调节和控制,使太湖自然环境优势不断扩大,并且使物质性环境焕发出人文的光彩,自然生态优势转变为人文生态优势,甚至转化为一种无形的社会控制的软力量。纵观历史,显然这种优势和力量由中古至近古具有积累、叠加的趋势,到清代时已十分明显和强大了。而正是这种人文生态优势和社会控制软力量,形成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质的规定,奠定了文化家族的系统结构模式,决定着清代江南文化家族及其文学发展的总体走向。

综上所述,太湖环境的物质性和人文性是互为对待、相辅相成的,太湖自然生态、景观风貌与文学精神、文学风格也同样交互影响,相对作用。而江南文化家族是具有鲜明太湖文化属性之家族,其家族文学根源于太湖地域又反馈、反哺于该环境,是太湖人文最生动、最灵慧、最富有活力的部分。从这一意义上说,要理解江南文化家族文学创造的风格与价值,固需以作品文本为据,亦当以太湖山水为镜。

(责任编辑:李亦婷)

## The Influence of Taihu Lake upon the Family Evolution and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Litterateurs from the Region South of Yangtze River

Luo Shijin

**Abstract** The region south of Yangtze River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profou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amazing cradle of classic Chinese literature since ancient times, the cause of which can be approached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south of Yangtze River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cannot be neglected in understanding how this region had kindled tremendous creativity in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Keywords** The Region South of Yangtze River; The Environment of Taihu Lake; Literary Family

① 尤侗:《百城烟水序》载徐松、张大纯《百城烟水》卷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②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诗》。